

论对联产生于唐代

余德泉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从平仄对仗开始被认识的时间结合新发现的对联材料来看,对联与律诗都发端于南朝齐梁年间,骈文和永明体的平仄安排方式是它们共同的源。对联和律诗是平行发展的,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对联产生于唐代,主要形式有口号、应对、酒令、题赠与堂室题联等5类。

关键词:对联;律诗;唐代

中图分类号:I05; I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3)01-0119-05

一、对联与律诗平行发展

蔡东藩云:“对联一门,谐偶文之变体也。谐偶文始于诗赋。古人之作诗赋也,只以声韵为主,未尝专尚对仗。至唐以律诗律赋取士,于是谐偶兴焉。俪青骈紫,判白妃红,文字之中,含有一种美术,未始不足观者。厥后或拟诗一联,贴于门楹,称为楹贴,亦号楹联。”^[1]笔者曾经同蔡东藩持同样观点,认为导致对联产生的,除对偶的修辞手法外,最关键的就是律诗,即先有律诗然后才有对联。

但从已发现的材料看,对联与律诗是平行发展的,皆发端于南朝齐梁年间的“永明体”,它们真正成为文体是在唐朝。

笔者在《对联格律 对联谱》中有这样的论述:“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周颙等人创立律句,要求在作诗时严格避免声韵的不合理搭配,而应通过平仄的抑扬和谐来构成诗歌的旋律美,即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间,轻重互异’,加上在诗中自觉地使用对仗,便开了唐代律诗的先声。只是诗句的句数不限,平仄尚不如唐代律诗那么严,对仗句的位置也不固定罢了。”^[2]看谢朓之《入朝曲》(‘—’表示平声,‘•’为仄声,下同):

- ①江南佳丽地, ②金陵帝王州。
- ③逶迤带绿水, ④迢递起朱楼。
- ⑤飞甍夹驰道, ⑥垂阴荫御沟。

⑦凝笳翼高盖, ⑧叠鼓送华年。

⑨献纳云台表, ⑩功名良可收。

此诗前八句全是对仗。从平仄看,律句的四种格式,即“平平平仄仄”(第①句)、“仄仄仄平平”(第⑧句)、“仄仄平平仄”(第⑨句)、“平平仄仄平”(第⑥句),全有了。但还不像唐代律诗那样讲求粘对。

又阴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 ①依然临江渚, ②长望倚河津。
- ③鼓声随听绝, ④帆势与云邻。
- ⑤泊处空余鸟, ⑥离亭已散人。
- ⑦林塞正下叶, ⑧钓晚欲收纶。
- ⑨如何相背运, ⑩江汉与城年。

这首诗也是十句,中间六句对仗。在这首诗中,还出现了“仄平平仄仄”(第③句)和“平仄仄平平”(第②④句)这样的平仄格式。后世五言联句之首字为领字,全句作一四节奏者,如“看东骧神骏”(昆明大观楼长联)之类,可能正是从这种平仄格式得到启发而发展来的,只是这首诗的停顿还不是如此。^[12]

到了唐代,人们一方面将“永明体”的句数定为八句,平仄讲粘对,又将对仗句固定在中间两联,从而形成了律诗。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将对仗句独立使用,于是产生了对联。对联在与律诗平行发展的过程中,某些方面受过律诗的影响,但二者并不是从属关系。而对联中的四言六言句及其平仄安排,则主要是受南朝时期骈赋的影响。

从唐初非律诗对仗句的独立运用,可以看出对

联与律诗的平行发展。《唐语林》卷三：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李司空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依何树？”嘉隐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依何树？”曰：“槐树。”公曰：“汝复不能矫对耶？”嘉隐曰：“何须矫对，但取其鬼木耳。”李叹曰：“此小儿狡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应曰：“胡头尚作宰相，狡面何废聪明！”

“胡头尚作宰相，狡面何废聪明”一联并非诗句。律诗在唐初尚未定型，这种非诗句对联的出现，说明对联的产生并不比律诗晚。

《湖北楹联集成·江夏分卷》收李道宗为武昌灵泉寺写的一副对联：

深山窈窕，水流花发泄天机，未许野人间渡；
远夜苍凉，云起鹤翔含妙理，惟偕骚客搜奇。

灵泉寺建于唐初，李道宗则为唐太宗之侄子，他为该寺题的这副对联既非律句，又相当正规，如果不是后人伪造，更可以说明对联与律诗的平行发展。

从有些诗先得到比较精彩的一联再配成全诗也可以看出对联与律诗的平行发展。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一诗即是例子：

(贾岛)逗留长安，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3](卷六, 79)}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在入诗之前是相对独立的，就相当于一副对联。后来入了诗，因而才未被视做对联。

律诗之“联”转化为对联是有条件的。香港梁羽生先生在《律诗之“联”不同于对联》中说：“(杜甫《蜀相》)中的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可说是囊括了武侯生平，因此可以抽出来，‘独立’作为武侯祠的楹联；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首联，进而描写祠堂的景物的，它就不如颈联之有独立性了，不过，可以用作表现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联。这类诗联是不大适用于作一般对联的。杜甫另一首《送郑十八》的七律，其中颈联‘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写的是两人间的私事，那就不能作为对联了。”^[4]

律诗可以摘句成联，其它文体也可以摘句成联。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人们尤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对仗句，这等于把它从《滕王阁序》中摘了出来。此乃骈文摘句。再如《唐语林》卷二中刘禹锡云：“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诸宫，予时在朗州，使一

介具奠爵，以中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从祭文中摘出对仗句单独使用，挽联即由此而生。我们可以认为，对联之长短句式正是以摘文章中之长短句式为发端的。

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中说：“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按不限于律句)摘出来，加以评赏，此风始于六朝。钟嵘《诗品》中即有其例。唐代批评家又用‘摘句图’这样一种形式，将标举警句这种批评方法固定下来，这些句子就更容易传颂人口。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作品流传的并非全篇，而只是其中的某些警句了。”搞“摘句图”是自觉的摘句，而人们通常是无意识地摘句。白居易入长安时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谒见大诗人顾况。顾始见其名便笑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待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加赞赏说：“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3](卷六, 93)}这两句诗也因此被摘了句，许多人熟记这两句诗，就犹如记下了一副对联。摘句这种形式，对于对联独立发展的影响是显然的。

二、对联产生于唐代

所谓对联，是指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而不是指构成这种文学形式的基本因素之一的对偶修辞格。对联是在人们已经有清楚的对仗与平仄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对联不可能产生在南朝齐梁以前。因为严格的对仗句(非一般的对偶句)在诗中的使用是从齐梁年间的“永明体”开始的，只是每首诗用多少个对仗句以及对仗句在诗中的位置都没有后来的律诗那么固定罢了。

王力先生说：“六朝以前未有四声的名称，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古汉语的语音里共有几种声调。”“四声之说，始于南北朝(按具体地说是齐梁年间)的沈约(441~513)、周诸人。”^[5]有意识地运用在四声基础上产生的平仄并形成一定的规则也是在“永明体”的诗中。《南史·陆厥传》：“时(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6]宫商，本指音乐的两个调，这里指平上去入交替使用，相当于今天之所谓平仄。又《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6](2798)}王力先生评论说：“就这两段史料看来，四声的系统在当时虽已成立，但还不曾为一般人所意识到，沈约等不过是先知者而已。”^[5]此前，人们不知道四声为何物，更不清楚平仄的运用规则，对对仗的使用也处于朦胧阶段，而懂得四声的是

极少数“先知者”。因此，我们不能把既讲究对仗又讲究平仄的对联的产生时间说得过早。而且有必要就某些说法，做个正确的评价。

庐陵何绍先在《对联汇海》中说：“考古家谓对联即桃符遗制，始于孟昶而盛于明孝陵（即朱元璋），不知此指门联而言。若堂室之题句，则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孔北海之‘座上客常满’，已为滥觞。”^①

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②《后汉书·孔融传》云：“（融）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尝叹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③从这两段引文可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并未独立使用，言者亦无对联意识，把它们视为对联的“滥觞”是不妥当的。

《世说新语》云：“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④有人据此认为对联产生于西晋，这显然不妥当。一是其时无平仄对仗观念，二是陆、荀在报名时不过在其姓名前加上籍贯而已。籍贯之“云间”与“日下”、姓名之“龙”与“鹤”恰好词性物类都相同，两句对得很工纯属巧合。

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说：“考宋（应为梁）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吊庆，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应当说梁代已有对联产生的基础。由于“生”与“卿”押韵乃诗最明显的特点，因此刘氏兄妹之作还算不得真正的对联，只是做诗而已。

人们通常把对联的产生定在五代或者宋初，其根据是迄今所见史书最早记载的一副对联是这个时候写的。《宋史·蜀世家》：“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广政 26 年，或者说北宋建隆四年，即 964 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⑤其实它是一副门联而非最早的对联。由于门联是对联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把对联的产生定于五代或者宋初，为时太晚。至今沿袭此说的原因，大概因为这是正史记载的第一副对联；而孟昶的对联又是题于寝门的，因此又把对联仅仅限于门联。这种认识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看到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一种文体从产生到被社会承认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南北朝时期，虽然有少数形似对联的东西，但那毕竟还不是对联。到了唐代，对联的运用进入有章可凭的阶段，长短句的格式也出现了。这可说是对

联正式产生的时期。从宋孟昶“每岁除”都命学士写对联来看，对联能写在门上，说明已经非常成熟，其产生时间可以上推许多年，这也就到了唐代。二是把对联局限于门联等于否认有其它形式的对联。正由于人们长期受这种观念的束缚，所以对对联历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事实上，社会上使用的对联，做门联的不少，但不做门联用的也相当多。自唐代以来，捏个对仗句对事物加以总结或嘲讽他人，或者你出上句我出下句互相属对以为娱乐者，时有所见。如果我们承认通过这些方式产生的对仗句也是对联的话，那么把最初的对联仅仅局限于门联，就没有多少道理。何绍先认为孟昶题联仅仅是门联之始而不是整个对联之始；门联只是对联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非最初的对联，更不等于整个对联；桃符不过是导致对联贴到大门上去的一个因素。尽管认为孟昶题联是“门联之始”的说法还欠准确，但他的观点是很对的。笔者提出对联产生于唐代，正是在与何绍先持相近观点的前提下，对五代以前的对联史料加以考察和研究的结果。

从发展规律上说，对联产生的初期应当只是口头的，一如口号之类，到了基本形成格局之后，才会被写到门上去。从现在已发现的材料来看，在孟昶之前，已经有了通过其它方式产生的对联（例见下文），而门联的产生要晚。

三、唐代对联类述

唐代已有多种形式的对联。就已知的材料，可以分为口号、应对、酒令、题赠和堂室对联等 5 种。

（一）口号

口号，即信口捏两句话对事物加以总结或嘲讽。其中有对仗与不对仗的，对仗的就等于一副对联。这种对仗的口号可能在齐梁以后至唐以前就有萌芽，但唐末进士王定保于五代时所撰之《唐摭言》中的例子都是唐代的。如：

何绢，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曰：“潘纬十年吟古镜，何绢一夜赋潇湘。”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郊郭，忽有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陨。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关于唐代的对联材料,有唐人直接记录的,也有后人补记的。因它们都有背景介绍,在今天看来,同人们之所调联语并无实质性差别。又《因话录》卷五: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余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

元和,唐宪宗年号。门与庙,均指右威卫。又《唐摭言》卷二: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浸去;唯卢弘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从事辈皆窃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元。后弘正自承郎将判鹾,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

卢弘正,亦做卢弘止,唐宪宗时进士。文宗时被人坐赃,险被杀,后为节度使。又《北梦琐言》:

唐道士陈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扑。郎中宇文翰改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

“上得不得”,改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而成。“悬之又悬”,改该书第一章“玄之又玄”而成。用的手法是同音飞白。又《明道杂志》:

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一日与宾佐出游,全忠忽指一地方曰:“此地可建一神址。”试召一视地工验记,而召工久不至。全忠甚怒,见于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视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干上龙蛇尾’,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或戏之曰:“若非干上龙尾,定当坎下驴头”矣。”

朱全忠,即朱温,曾参加黄巢起义军,降唐后赐名全忠,封梁王。哀帝天四年(907年),篡唐自立,国号梁,从此五代开始。视地工,看风水的人。干和坎都是八卦卦名。宾僚们将坎谐指砍,嘲讽这个风水先生巧于奉承,才保住一条性命。

(二) 应对

应对有两种:一种是对他人的回敬,如前面“胡头尚作宰相,猿面何废聪明”即属此类。另一种情形

是一人出上句,一人对下句。如李绰《尚书故实》:

会昌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斋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者,巡复两街诸寺,见银佛像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扛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答曰:“无过‘密陁僧’也。”

密陁僧,即今之氧化铅。此联“密”对“苏”(谐疏),陁对“扛”。陁,陀也,疑谐驮或拖。此联用的借对。又《全唐诗话》“温庭筠”条云: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这是一副标准的每边两句联。此事南宋绍兴间湘西提举吴炯在其《五总志》中亦有记载,只“赵公”为“邵公”,未详。

(三) 酒令

酒令为旧时饮酒中助兴取乐的一种游戏。推一人作为令官,余人听令轮流说一两句话,对仗与不对仗皆可。对仗者事实上就成了对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香山居士”条所载的一个唐人酒令即属这种情形。

[令] 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答] 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釤麑,春秋时晋国力士。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恨大臣赵盾多次进谏,派釤麑行刺赵盾。清晨前往,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豫让,春秋战国间晋人。《后汉书·豫让传》说他初事范中行氏,后事智瑶。智氏为赵襄子所灭,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白哑,多次谋刺赵襄子,欲为智氏复仇。被赵襄子所获后,问他何以不事中行氏而反事智瑶,答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愿伏诛,请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而击之后,自刎而死。¹⁶¹⁽²⁸²⁾“木”“鬼”,“槐”也。“山”“灰”,“炭”也。这个酒令同后来的析字联没什么两样。又如:

[令] 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答] 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这个酒令,[令]重言“马”字,[答]重言“李”字,位置相应,同后来的重言联手法相同。

(四) 题赠

题赠联,亦称交际联,是为赠送友人而撰写的对联。如唐穆宗御赐楚国公陈师孟联(原载湖北黄梅《陈氏宗谱》):

麒麟阁上精神爽，

虎豹关前胆气豪。

又如唐僖宗赠陈氏义门联曰：

九重天上旌书贵，

千古人间义字香。

此联载于湖北黄梅、咸宁、大冶等地之《陈氏宗谱》，安徽白启寰先生发现《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亦有载。陈氏宗祠至今还刻有此联。

(五) 堂室联

堂室联，即题于楼堂馆阁之对联。如前面所举李朝宗题灵泉寺的对联。下文所举之若干副，多为闻楚卿先生搜集。如清代《咸宁县志》载李邕题太平公主南庄联：

流风入座飘歌扇，

瀑水侵阶溅舞衣。

李邕，武则天时人，官北海太守，文学家兼书法家。因忤权贵，屡遭贬斥。唐玄宗天宝六年，被李林甫杖杀于狱中。《江夏分卷》载释晓然题武昌灵泉寺联：

千崖竞秀旷怀远，

万壑争流法眼宽。

释晓然，俗名李洞，为李邕长子。其父被害后，入灵泉寺为僧，并创建灵泉书院，对江夏文化颇有贡献。《唐语林》卷三有一联(下打横线者)：

(骆浚)典名郡，有令名。于春明门外筑台榭，食客皆名人。卢中州题诗曰：

“地甃如拳石，溪横似叶舟。”即骆氏池馆也。

骆浚，唐宪宗时人。卢氏为其池馆所题诗句在今天看来，就是一副胜迹联。清代《汉阳府志》载有杜牧(唐宪宗至宣宗时人)题汉阳渡口联：

残灯明市井，

晓月辨楼台。

钟祥文史资料载有郑谷题钟祥莫愁湖水阁联：

一片湖光比西子，

千秋乐府唱南朝。

郑谷，唐僖宗时进士，此联为其游钟祥时所题。

方东先生在福建《霞浦县志》和《福鼎县志》上发现了三副唐代的堂室对联。下面例举的一副为唐僖宗时进士林嵩所题：

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

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

林嵩，字神降，福建霞浦人。唐懿宗时读于礼部草堂，此联即题于草堂之上。

这些对联资料，从唐太宗时期一直延伸到唐僖宗时期，而且对仗平仄也符合规则。一千多年前就有如此水平，真是难能可贵。

注释：

① 这段话为 10 年前手录，版本失记。

参考文献：

- [1] 蔡尔藩. 联对作法[M]. 上海: 汇文堂新记书局, 1993.
- [2] 余德泉. 对联格律·对联谱[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3] 辛文房. 唐才子传[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4] 梁羽生. 名联谈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5] 王力. 汉语音韵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6]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二十五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 [7] 诸葛亮. 诸葛亮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8] 徐震. 世说新语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9] 王力. 古代汉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0]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Couplet originated in Tang Dynasty

YU Deq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holds that both couplet and regulated verse originated from the period of Qì Liang in Nan Dynasty. They were simultaneously develope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ouplet had five types: slogan, rephrasing, drinker's wager game, inscription presented as communication and antithetical couplet inscription in the hall.

Key words: couplet; regulated verse; Tang dynasty